

臺灣教育社會學研究 十一卷一期

2011年6月，頁1～40

全球化下低教育原住民回鄉就業的 漫漫長路：社區菁英的角度

郭俊巖

摘 要

本文旨在探討原鄉地方文化產業的發展實況和低教育原住民返回部落謀生的就業歷程，為了達此目的，本文採用深度訪談法針對信義鄉社區菁英進行質性資料的蒐集及分析。研究發現，至今信義鄉文化產業發展有限，部落生活機會匱乏，居民謀生不易，回鄉者舉步維艱。顯示近年來政府相關部門致力於推動原鄉文化產業來繁榮部落、促進就業和振興教育文化的政策目標仍難實現。然而，倘若原鄉地方文化產業是值得繼續推展的國家型大計畫，政府理應增加原民會的權責，強化其統籌規劃與政策執行的力量，並結合在地意識和地方需求，逐一落實原鄉各項發展計畫，以期使部落居民也能享有與臺灣一般民眾同等的教育質量、就業條件和公共福利。

關鍵詞：原住民、貧窮、教育、全球化、工作福利

- 本文作者：郭俊巖 靜宜大學社會工作與兒童少年福利學系副教授。
- 投稿日期：98年7月17日，接受刊登日期：100年2月15日。

*The Long and Winding Road for the Poorly
Educated Indigenous People to Return Home
Employed amid Globalization: From the
Viewpoint of Community Elites*

Chun-Yen Kuo

Associate Professor

Dept. of Social Work & Child Welfare

Providence University

Abstract

As the poorly educated indigenous people were forced to return to their tribes, they were faced with mounting challenges of underdeveloped cultural industry and unemployment due to globalization. This study revealed their unsettling journey home, from the viewpoint of community elites. Qualitative data were collected through in-depth interviews. Findings showed that, in Sinyi Township,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traditional tribal arts, and sophisticated agriculture were suffocated by natural disasters and problems of transportation, legislation, and funding. Despite the governmental efforts, those poorly-educated returned home and remained unemployed in their tribal regions. In order to overcome all these challenges and difficulties, the researcher suggested that the Council of Indigenous Peoples of Executive Yuan should be empowered to consolidate policy planning and implementation, as well as to coordinate with local awareness and needs.

Keywords: indigenous people, poverty, education, globalization, workfare

壹、前言

近幾十年來，全球化改變了全球社會的產業結構與就業型態，引致工業國家相繼面臨失業、所得分配不均與貧富差距日趨惡化的窘境（Esping-Andersen, 2009; Giddens, 2000; Pierson, 1998; Romano, 2006）。相應地，全球化下的臺灣社會，失業貧窮亦困擾著許多人，但主要是原住民族。雖然臺灣原住民族歷經1980年代原住民權利運動及後繼原運的種種努力，原住民族委員會的成立、《原住民族身分法》等法令的相繼實施，原住民族的社會位置確實有改善，且與臺灣各族群間在教育和職業隔離方面也日益減弱，但與主流社會相比，原住民仍沒有改變淪落臺灣社會最弱勢族群的樣貌（黃毅志、章英華，2005；劉千嘉、林季平，2008）。至今，原住民總是生活在社會底層，處於經濟弱勢和政治無權無位，長期遭到社會的歧視與資源、機會剝奪。在此情形下，造成許多低教育、低技術原住民在就業和生活上仍面臨諸多難題。

再者，即令國內近年來在多元文化理念下對原住民族各方面的訴求和需求，已逐步有善意的政策回應，但實際運作上，政策理念落實之速度似乎相對遲滯，至今尚無法有效縮短「原、漢族群間」各項生活水準之結構性落差（詹宜璋，2003）。依原民會調查，當今原住民家庭與全體家庭平均年所得差距還達2倍以上，且原住民家庭的收入來源結構依賴薪資收入的程度非常重，比重達91.5%，遠高於我國全體家庭73.2%（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2007）。顯見原住民個人和家庭必須更依賴工作獲取基本維生資源。但近年來因國內不景氣、產業外移和外勞引進，使得原住民在都市的工作機會日減，謀生更困難。以致從1990年代中期以來，有許多失業原住民回流原鄉尋求有限的生存機會。

我國政府爲了回應原住民的失業問題，近十幾年來陸續在原鄉推出許多相關措施，如提供就業服務、促進就業機會、擴大職業訓練和原鄉產業發展

計畫等（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2008a）。但從實際執行面看，政策的落實有限，迄今，原鄉內部在教育、產業發展方面的改善有限，短期促進就業和職業訓練成效不彰，外部環境如引進外勞、產業外移等問題仍然存在。目前原鄉的生活機會依然有限，居民仍難安身立命，回鄉者舉步維艱。對此，研究者認為原鄉的發展限制和就業問題，除了亟需政府投入更多對策與資源外，更重要的是，政府應轉變夙來「由上而下」且難迎合部落需求的政策制定模式，從而針對個別原鄉部落的實際需求進行了解，並謹慎評估如何適切地結合當地有利資源，以協助原鄉開創具有競爭優勢的地方文化產業和就業型態。

但若要進一步掌握原鄉的就業問題與需求，以及在地產業發展的可行方向，實有必要深入探析在地人的體驗和看法。故而，本論文的主軸即以久居信義鄉的社區菁英為研究對象，並以質性深度訪談法進行資料蒐集，希冀藉由在地菁英的主體經驗和詮釋，深入了解原鄉發展困境與回鄉者生活難題之問題癥結，並依研究所得結果，提供政府規劃原鄉發展政策的思考方向。

貳、文獻探討

國內原住民族雖然人口數量一直有增加，但長期以來在經濟、社會、政治、教育、文化和福利等層面卻依然居於弱勢地位。問題是，這般多面向弱勢及弱勢的累積現象，又會形成社會排除（social exclusion）問題，它勢將直接影響原住民的社會參與，尤其是勞動市場參與的能力和機會。按 Burchardt、Le Grand 與 Piachaud（1999）之意，社會排除是指在社會中，個人無法以該社會的公民資格參與正常活動的情況。意即當社會成員在社會參與、政治參與和經濟活動參與等層面參與不足，或無法參與，即被視為社會排除。

再依 Giddens（1998）說法，社會排除係指那些長期被排除在主流社會外，與社會之物質繁榮和文化脫節的社會底層人們。Giddens（2000）繼而

指出，社會排除與貧窮、被剝奪並不相同。社會排除並非與他人在程度上的差異（如擁有較少資源、機會），而是指無法分享大多數人所擁有的資源、機會和權力。貧窮或被剝奪的人是勞動市場競爭的失敗者，而被排除的人甚至沒有參與勞動市場競爭的機會。換言之，弱勢原住民的失業問題若不能獲致有效解決，那麼失業原住民極有可能變成長期失業的貧窮者，從而成爲被社會排除的邊緣人，同時他們將會日漸喪失就業市場所需求的技能和工作紀律，並再也很難重回就業市場。也因此，弱勢原住民的失業問題，是目前政府亟需關注的議題。底下針對原住民參與勞動市場的幾項結構性限制進行討論。

一、全球化與工作消失

全球化現象並非最近才開始的人類處境，只是它的歷史起源在不同論者有不同的說法（孫治本譯，1999；莊勝義，2007）。但就發展的角度，全球化是在晚近幾十年中加速出現的世界性趨勢，雖然不同學者有不同界定，但最常被用來解釋世界經濟格局大變遷的是經濟全球化。在這過程中，世界經濟活動日趨邁向整合，如世界貿易組織（Dicken, 2003），這顯示了全球性資本市場、商品市場的形成，加上近年來勞動力市場也日益開放，構成經濟發展各項基本要素：包括資本、商品、資訊、技術、工作和人員，能跨越國與國之間的界線，在世界範圍流動（郭俊巖、王德睦，2008）。這些變化趨勢，無疑增強了資本跨越時空的逐利能力，但同時卻弱化了各國在經濟和社會政策上的調控能力，引致各國勞工陷入不可預知的就業風險，尤其產業的轉型和跨國移動，更使得低技術勞工在就業市場中愈來愈被邊緣化。

關於基層勞工的處境，Bauman（1998）即悲觀指出，當代社會，進行大量生產已不再需要大量勞動力，利潤增長反而是立基在縮減勞工的條件上。此即Beck指稱的無工作成長邏輯，這種藉由自動化生產技術提高單位生產力的無工作資本主義（capitalism without work）的發展趨勢，將使先進國家的工作職位日減，失業人數日增，即便新增高教育、高專業職缺，也極

可能無助於低教育勞工的就業（孫治本譯，1999）。更重要的是，目前各國即令傳統工業化型態的工作方式也日益以自動化或知識為基礎，從而改變原來需要依靠密集勞力從事生產的製造業本質。此意即，工人原本只被要求不斷重複範圍狹窄、不用投入心思就可完成的工作，已被自動化生產徹底顛覆。這種去工業化（deindustrialization）的風險，顯示在全球範圍的體力工作職缺遽減，失業人數遽增，且還會讓愈來愈多人被迫永久失業和無法再被僱用（鄭陸霖、吳泉源譯，2004；Bauman, 1998）。

由上可知，面對全球化新經濟時代的浪潮，不但帶給先進國家勞動者一系列新的失業風險，而臺灣的產業結構及勞動條件，莫不與外貿出口導向的產業結構息息相關，致使臺灣的勞動條件也無可倖免地深受世界市場的衝擊（鐘琳惠，2007）。近年來，我國深受全球景氣蕭條和內部需求低迷不振的影響，引發國內許多因應能力較弱的中小型企業紛紛關廠歇業，或將產業轉移至生產成本較低廉的國家進行投資設廠，形成許多低技術工作機會逐漸消失。也因此，使許多原本在這個次級產業部門靠體力勞動維生的原住民深陷失業貧窮之苦。在此情況下，政府如果沒有制訂一套完善的社會政策協助低教育原住民脫離不利處境，那麼原漢之間的所得差距和不平等狀況勢必愈拉愈大，結果將使原住民族的失業貧窮問題陷入積重難返的窘境。

二、原住民低教育程度限制職業選擇

在當今知識經濟盛行的時代，一方面藉由資訊科技帶動的自動化生產模式日漸普及，再方面企業雇主日益要求具有創意、創新能力的勞工，使得低教育勞工的就業條件日趨惡化，同時也加劇了現有社會的不平等。對此，Giddens則指出，若要克服當今資訊知識落差所造成的經濟不平等與改善低教育者的市場價值，那麼擴大教育投資和讓更多窮人接受較高教育是最佳的途徑（黃瑞祺編，2005）。而許多西方學者也提及，在當今全球化和後工業體制盛行的年代，教育投資對個人人力資本的發展、社會貧富差距的舒緩以及國家全球競爭力的提升，皆是不可或缺的一環。更明白地說，政府教育投

資不僅能增進教育機會平等，同時也能促進就業和減少社會排除，甚且還有助於經濟繁榮和社會整合（Esping-Andersen, 1999; Giddens, 2000; Latham, 2001; Tomlinson, 2005）。

而我國《憲法》也明文規定：「國民受教育之機會一律平等；國家應注重各地區教育之均衡發展」。即令如此，在教育投資和教育機會均等方面，長久以來我國政府並未十分重視原住民教育。這顯示在部落教學設備缺乏、師資不足和流動率高，尤其課程架構與教學內容是以漢人價值觀和判斷為主，而未能符合原住民社區本位課程，使得原住民學生的學習適應不佳、學習成效不彰，形成高輟學率與低升學率，致使原住民教育水準普遍低落（吳天泰，2007；陳逸君，2004；譚光鼎、張如慧，2009）。因而當原住民至都市謀生，大多只能在次級勞動市場從事骯髒、勞累和危險的粗工。

問題是，此類工作的替代性高、風險也高，原住民勞工隨時可能因產業結構變遷或景氣蕭條而失業。在謀生困難、家計壓力的情況下，迫使許多原住民子女無法得到良好教育。但接受教育是重要的，因貧窮問題係根源於窮人無法接受良好教育（Blair, 1996）。根據研究顯示，貧窮家庭生活困難，子女通常無法獲得良好教育和找到適當的工作，因而謀生也就相對困難，於是又經歷了上一代的劣勢處境，形成貧窮和不平等現象代代惡性循環（林萬億、孫健忠、鄭麗珍、王永慈，2005；Giddens, 1998）。對此，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2008a）的調查也顯示，目前教育程度仍是影響原住民就業和收入的關鍵，雖然近年來原住民整體教育程度已明顯提升，但仍落後一般民眾許多。¹無疑，教育程度的提升對原住民能否增強職場競爭力和克服貧窮循環格外重要，值得政府多關注。

¹ 一般民眾專科教育程度占13.2%、大學以上占21.2%，合計34.4%；而原住民合計只占15.2%，即專科6.5%、大學以上8.7%（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2008a）。

三、原住民不利的就業結構與外勞效應

在1970、1980年代期間，還算是原住民到都市謀生較順利的時期，只不過這時期原住民從事的工作，往往是漢人不願做的底層勞力工作，凡是最遠、最高、最深及最暗的工作場所，都可看到原住民的足跡（何家豪，2002）。但自1980年代隨著新國際分工和全球資本轉移與擴張，使得資本和勞動在國際間產生高度的流動（Coates, 2000），而臺灣產業界也為了尋找低廉勞動成本紛紛外移，與此同時，政府在1989年也開始開放工資相對低廉的外勞以滿足企業需求。在此多重因素衝擊下，原住民在都市的工作機會日漸消失，許多失業原住民被迫回原鄉謀生。原本回鄉工作應是解決失業的方法之一，但囿於原鄉就業機會有限，他們大多待業等機會，頂多只能靠打零工維生（王增勇，2002；朱柔若，1999；李明政，2003；曾筱甯，2001）。由於低教育原住民在都市的不利就業結構，和原鄉低度發展無法滿足就業需求，使得他們無論在都市或原鄉，其就業前景可謂每況愈下。

時至今日，國內景氣雖稍有回升，但基層勞工的失業率仍維持在高檔，低教育原住民的失業問題依然嚴重。根據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2008a）的調查顯示，原住民就業者從事的行業以「農林漁牧業」、「營造業」及「製造業」占大多數，且主要是擔任該行業的非技術工和體力工。凡此顯示，原住民投入的就業類型大多屬於低技術、低保障且容易被外勞替代的工作。

循此，就外勞政策來說，原先政府的外勞政策係設定在「補充國內基礎勞力不足」的層面。其政策原則係採取「限業限量」漸進式開放，但在實際執行層面，政府基於企業界的需求卻不斷放寬外勞政策，而目前國內各工業區的工廠雇主，依舊偏好雇用成本低廉且好管理的外勞（馬財專、余珮瑩，2008）。問題是，外勞所從事的工作類型與原住民重疊性極高，皆是以體力勞動和非技術性的工作為主。如今外勞已成為我國的基層勞動力，多半從事製造業、營造業、監護工或醫療看護等勞力工作。而這些行業在我國工業及

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創造較多就業機會，勞動力需求也較多，所以常為無技術或半技術的原住民提供就業機會。如今外勞大量引進成為對原住民勞力替代，產生市場排擠效應（巫銘昌、黃燕萍，1998；黃坤祥，2005）。結果使得原住民面臨工作條件日趨惡化，失業率持續攀升的危機。

四、歧視問題

在臺灣社會，漢人常以偏頗的刻板印象、族群偏見和族群歧視對待原住民，這些原漢接觸的經驗，幾乎成為多數原住民心中最難以忘懷的刻痕（傅仰止，2001）。長久以來，在漢人「我族中心主義」（ethnocentrism）的思想中，原住民族是落後的族群，因而接受漢化是天經地義的事（謝世忠，1987）。由此，在大漢民族心態下，漢人對自屬文化奉為至高無上的一種「迷失信念」（mythical belief），成了漢人對於原住民一種歷史性的歧視，長期下來使得原住民形構了自我認同的污名化，並將其自身的負面感受表現在價值觀和行為上，如否定自己、自卑感和缺乏自信心等（郭俊巖、許佩茹，2010），而這些負面的自我認知隨著原住民在社會化歷程不斷積澱而損及人格成長和影響原漢互動。

正因社會歧視係源自複雜的社會歷史脈絡，引致社會歧視的歷史累積負向效應，經常在各種社會生活領域限制原住民族的生活機會與社會地位，尤其當原住民外出至漢人社會求職謀生，時常遭逢本身因弱勢族群身分而受到漢人的異樣眼光和不公平對待。在職場所遭遇的問題包括工作負荷量過重、同工不同酬，使得原住民在職場上不易發展（張清富，2001；陳珊華，2009）。

近年來即令我國政府在制度上或形式上致力於消除歧視現象，但問題是，泯除社會歧視不可能只靠政府的宣導和法令頒施就能達成，它尚須在最深層的社會結構及個人心理結構產生正向的改變纔能致之。換言之，主流社會對於原住民的價值偏見不是那麼容易可以從人心中去除，它依然可能以一種隱而未顯的方式藏身在社會生活的各層面，並延續著偏見、歧視的歷史遺

風（張培倫，2009）。目前臺灣某些民眾或雇主對於原住民勞工的偏見、歧視猶然未消除，甚至依舊成為雇主不願意聘用原住民勞工的原因。

五、短期促進就業是治標而非治本之策

近年來政府為了舒緩原住民的失業貧窮問題，開始推動一系列的短期促進就業政策，提供原住民臨時工作機會，以期在短時間內疏解原住民失業率問題。按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2008b，2010）的調查顯示，原民會結合相關部會推動的短期促進就業措施，確實對緩解原住民失業率具有立即的改善效果，同時也可以視為失業原住民求職的過渡性工作，採用「以工代賑」的方式逐步將失業原住民導引至正規就業市場。

但從先進國家解決失業問題的經驗顯示，由公共服務促進就業之類的措施直接創造工作機會，在失業率突然升高或失業率長期居高不下時，確實可在短時間內達致降低失業率的效果，故而成為在高失業期間被廣為採用的一種勞動政策（傅從喜，2006）。但根據研究指出，這類短期性工作創造方案所提供之低薪無保障的工作，根本難以將失業者轉型為成功的工作者，因這類方案通常沒有對福利案主施予教育訓練，且方案所指派的工作，多半是無技術的體力勞動，好比清掃公共場所、維護環境之類的工作。事實上這些工作的提供並非為了提高受助者的就業能力，而只是為了讓失業者有事可做（Handler & Hasenfeld, 2007; Piven & Cloward, 1993; Quaid, 2002; Wilson, 1987）。

當今在學術討論上，這種短期性工作方案或以工代賑之類的社會救助，在引導失業者重返正規勞動市場的作法被批評過於消極，以致在先進國家通常不將這類短期性就業方案視為常態性或制度性的福利措施。因而自20世紀末期興起的工作福利政策（workfare），²則被視為解決弱勢族群陷入貧窮、

² 工作福利政策的實施原則：要求福利救助的領取必須取決於該員接受政府資助或設置的職業訓練活動，以便讓受助者在領取福利給付的同時，能夠增進就業技能，重新融入正規勞動力市場。

長期失業與社會排除的最佳方法（孫健忠，2009；郭俊巖，2010；簡守邦，2008；Handler, 2004; Wolff, 2004），因為這類工作福利政策發展出一套較周全、較能提升弱勢者就業能力的職業訓練與就業服務機制：包括工作查詢、工作訓練、就業輔導、教育方案、社區工作體驗以及其他支持性服務（如兒童照顧、日托服務）等項目（Lødemel & Trickey, 2001; Wilson, 1987）。

近年來，以工作福利替代社會救助的積極性服務模式，已成為各個國家協助原住民脫離弱勢處境的重要策略。例如，加拿大之「社會救助與訓練和發展的連結」以及「與原住民組織共同發展新的訓練機會」；美國引導原住民朝向自立的「公共救助就業化政策」，其制度精神也含有積極福利的表徵；紐西蘭的從「福利」到「福祉」之策略，皆為朝向積極性的工作福利方向邁進的重要措施（黃源協，2008：161）。由此可見，與工作和教育訓練相關的社會福利議題日趨被西方國家所重視與推展。

目前許多西方國家正是在工作福利理念下，為原住民提供就業機會、職業訓練與就業輔導，但無論由公部門主導或結合第三部門，都以配合在地社區產業特色為基調。而我國原民會自1997年以後，也為了因應回流原鄉就業的潮流，開始規劃就業政策與原鄉在地產業發展（如文化、觀光、特產）相結合，希望藉由推動原鄉文化產業化，創造適合的職種和就業機會，以建立社區化就業模式。若如是，不僅可使原住民能優先選擇在原鄉就業，甚而使返鄉謀生的原住民能順利就業。但問題是，目前原鄉在地文化產業闕如，失業問題依然嚴重，即便政府推出一些短期性就業方案，也難以做為原住民通向正規勞動力市場的跳板。從政府的原鄉產業計畫和就業政策檢視，目前原鄉的就業出路猶待政府努力解決。

參、研究方法與研究設計

本研究是想透過地方菁英角度，探討全球化下臺灣原住民的就業處境，

以及原鄉發展限制和部落就業問題之癥結。爲了達此研究目的，本研究採用質性深度訪談法爲研究基礎。

一、研究場域

本研究選擇信義鄉爲研究場域有四項理由：1.研究者長期關注貧窮議題；2.921大地震信義鄉受創嚴重，復原緩慢，長期低度發展，生活機會有限，故而引起研究者對此場域的關注；3.研究者的碩士生來自信義鄉布農族，³在與研究生及其家族長期互動下，對信義鄉的發展情況和就業問題有了某種程度了解，由此引發研究者構思藉由學術角度探究信義鄉的發展限制與就業問題之癥結；4.研究者獲得政府單位補助在信義鄉爲期一年研究（2007.8～2008.7），這當中，本研究之受訪對象包括社區菁英6位和回鄉謀生者5位，但限於篇幅，本文僅就社區菁英觀點進行探討。

二、資料蒐集方法

本文主軸在於藉由社區菁英視域深入了解原鄉的發展限制與就業困境，故研究方法以半結構、深度訪談法爲主。而質性深度訪談法的特點，在於它可以協助研究者藉由訪談方式產生新的想法和觀念，進而擴展研究資料的蒐集（朱柔若譯，2000）。這種深度訪談法是對特定議題透過研究者與受訪者在自然情境下進行面對面的雙向交流，這當中，研究者會適度引導議題討論，同時讓受訪者針對議題，充分表達自己內心的真實感受與其對事務的看法。

爲了使資料蒐集更具系統性，研究者根據文獻探討中的核心問題擬定訪談大綱，進行深度訪談。在訪談的主題上，除了個人基本資料外，主要包

³ 研究者的學生其家族成員多人在信義鄉任公職，而研究者也在其家族成員的引薦下，有機會接觸觀察信義鄉的一些活動（如旁聽鄉務會議、鄉運動會、隨村幹事訪查案家等），並從中認識許多地方菁英和回鄉就業的弱勢者。

括：低教育原住民在都市和原鄉的就業歷程；原鄉地方文化產業發展的限制與出路；政府相關就業政策的檢視。在訪談過程中，研究者依預先備妥之訪談大綱依序提問，當中如受訪者提供的資訊深具開拓性與分析性，即便偏離或超出訪談大綱題序，研究者皆秉持開放態度循此脈絡深入探問，並調整問題順序或增列題項，讓受訪者能充分闡述重要訊息。如此，非但可增加訪談內容的精緻性和豐富性，甚且可獲致更多與研究議題相關的寶貴訊息。另外，研究者每次實地訪問，都習慣做筆記，這樣做不僅能提醒研究者與受訪者在訪談過程中有哪些重要訊息有待進一步說明或釐清，而且這些筆記資料對日後在分析和萃取逐字稿內容的關鍵概念及重要發現亦有幫助。

三、研究對象

由於本研究所關注原鄉的發展限制與就業困境等議題，涉及的層面相當複雜，包括臺灣的勞動條件、地方文化產業以及原鄉的教育和職訓等面向。也因此，欲尋找可提供研究議題之重要資訊的研究對象極不易，且因信義鄉土地面積廣闊，各部落的人文地理條件差異頗大，使得尋求適合的訪談對象更形困難。基於此，本研究在訪談對象的考量上，係以熟稔原鄉公共事務或服務範圍擴及全鄉之地方菁英為主要對象。

依此，研究者與熟識的地方菁英經過多次討論後，採立意取樣（purposeful sampling）設計，選出六位足以提供本研究主題相關資訊的訪談對象。這六位受訪者，在信義鄉的公、私部門擔任不同的重要職務，他們長年生活在原鄉，對原鄉各項發展限制和居民就業狀況皆有深刻體認，透過其主體經驗的述說，著實對本研究主題的探索有莫大助益。為了顧及研究倫理，受訪者背景資料均以代號A1、A2……匿名處理（見表1）。至此，猶需說明的是，本研究受訪者在其生命歷程，無論是工作或求學，大都會在都市居住過一段頗長的時間，而這些經歷讓他們返鄉服務能有更深刻的體悟。對本研究而言，受訪者豐富的生命經驗無疑更具深廣的視野，且能提供本研究主題所需的重要資訊。

表1 受訪者背景資料表

代號	性別	年齡	族別	教育程度	職業
A1	男	約 60 歲	布農族	國小	鄉民代表
A2	男	約 40 歲	布農族	大專	地方公職人員
A3	男	約 50 歲	漢人	高中	村長
A4	女	約 35 歲	布農族	大專	國中教師
A5	女	約 45 歲	布農族	大專	社福機構人員
A6	男	約 45 歲	布農族	碩士	地方公職人員

然則，本研究受訪對象A1和A3，雖然分別在教育程度及族別落差較大，但研究者認為並無損於重要資訊的提供。就A1來說，早年曾至都市從事各類勞力工作，中年返回部落經營高經濟作物，至今已連任多屆鄉民代表，期間參與諸多鄉務工作和原鄉發展計畫。在訪談過程中，更得知受訪者曾多次出國考察國外原住民部落及當地原住民政策，雖然受訪者只有國小學歷且年齡較長，但依其豐富的人生閱歷，確實能提供本研究主題相當厚實的資訊。再就A3來說，雖是原鄉漢人，但自祖父輩即定居信義鄉從事農業，目前在原鄉經營精緻農業，同時擔任村長和某權益促進協會重要職務，由於受訪者自幼生長在原鄉，且時常參與鄉務工作，因之對原鄉的發展狀況和就業問題有深刻洞見，以致本研究選取A3為訪談對象。

四、資料蒐集與分析

本研究在深度訪談前，事先取得受訪者同意，採全程錄音，以便在訪談結束後，進行逐字稿整理時，能夠擁有訪談資料的精確性和完整性。原則上，訪談資料的蒐集和分析需同時進行，如此才能隨著訪談資料的逐步呈現，適時調整研究議題和訪談題目。而本研究每次訪談結束後，便將訪談所獲得的資料整理成逐字稿，隨後，研究者反覆詳讀逐字稿，以分析訪談資料與研究主題的關聯性，並從中找出有意義的陳述，加以歸類和命名，逐步整理提煉出符合本研究目的之概念架構。

五、研究限制

本文尚屬初步和相關研究中的部分成果，在研究討論上尚有某些限制。底下針對幾項研究限制加以說明：1.資料分析與詮釋上的限制，由於信義鄉極為遼闊，且所屬14個村落的發展脈絡和營生條件不盡相同，而本文僅就6位菁英的觀點進行剖析，尚未有足夠信心宣稱所收集資料已達飽和程度，甚至在資料分析與詮釋上也僅能就訪談資料範疇進行探討，故研究結果可能尚不足以代表各村落的生活脈絡和實際需求，因而要做更大範圍推論亦有限。2.受訪對象的社會階級限制，因篇幅有限，本文僅針對原鄉菁英觀點進行分析，但菁英的視野非能代表原鄉整體觀點，因而在探討原鄉的問題與需求時，猶需納入原鄉相對較低層人士之觀點。3.受訪對象原漢比例的限制，由於本文部分議題主要在討論「原住民地方文化產業」，因而受訪對象主要設定在原住民菁英對此議題的詮釋，但在熟識菁英引薦下，認為漢人受訪者A3對原鄉公共事務和精緻農業多所涉入，頗能代表原鄉問題的聲音，而研究者當下亦與A3進行非正式交流，感受到A3確實能提供重要的資訊，因而將其邀為受訪對象。然則，信義鄉目前原漢人口比例大約55%比45%，依此，就原鄉整體發展角度而言，漢人的意見參與是有其必要性，而本文受訪對象只選取一位漢人，就比例是偏低。在當今多元文化概念架構下，原漢融合共創原鄉社會是大勢所趨，因而未來針對原鄉之研究理應納入多元族群和多樣類型的觀點。

肆、研究發現與討論

臺灣原住民的機會結構有限已是不爭的事實，尤其原鄉因各項資源極度匱乏，許多原住民尋求三餐溫飽是他們基本的奢求。問題是，如果原住民繼續延續僅能餬口的就業歷程，不僅對自己家庭及其子女的教育和就業機會有不利的影響，甚且還會形成窮人子女永遠是窮人的貧窮世代循環。因而目前

原住民族面臨的就業困境和生活危機值得政府多加關注。底下本文結合文獻分析與訪談資料探討原住民的就業問題、低教育原住民回原鄉的就業狀況以及原鄉產業發展實況。

一、原住民族的就業問題

(一)群居習性影響就業

原住民長期居住在地理位置相對孤立的環境而發展出獨特生活模式，使得早期原住民進入都市謀生，在與漢人互動過程中，其生活適應和職場適應也相對困難，並產生一些社會文化隔閡（李明政，2003）。如受訪者（A6）提及：

早期因為我們原住民很木訥，加上語言跟外面又不是溝通的很順暢……大部分都是用國語溝通，就是有那個隔閡，所以我們原住民很少單獨出來就業的，大部分都是結伴。

其中受訪者（A5）強調原住民非因懶惰影響工作，而是群居和適應問題：

跟我們的文化有關……像我們布農族的話是重於分享……我之前有看到報章雜誌就說我們原住民一天捕魚三天曬網，就很懶惰（刻板印象），其實不是。有的就是第一個就是適應性，第二個就是說他是一個群居的，就是他若是沒有一個比較熟悉的朋友，他就比較容易離開那個地方，……可是一個要離開的話，三個會跟著被影響。

對此，受訪菁英亦提到：

在一、二十年前是這樣的……都會成群結隊的去到一個公司，然後整個集體就辭職了這樣（A2）；因為可能到大都市去，……他可能想

說大家在一起比較不會被人家欺負（A4）。

一般來說，原住民族除了長期群聚型態塑造出集體生活和共同分享的文化習性與現代工商社會格格不入之外，也由於過去與漢人接觸機會較少而心生畏懼，因此常藉由集體就業增加自我安全感。但這般集體就業和離職的情況，卻也構成漢人雇主僱用上的疑慮而影響其就業機會。不過，現今集體就業習性已不多見（詳後）。

（二）工作認真但樂天和酗酒影響工作

依張清富（2001）、傅仰止（2001）和衛民（2000）的研究指出，原住民勞工樂天知命，部分嗜酒成性，常因此而丟失飯碗。受訪者提到，原住民在工作上其實很賣力，但由於樂天態度常無故曠職，有些則過度飲酒而影響老闆僱用意願。如受訪者指出：

我們原住民比較樂天，不上班就不上班，沒有那個請假的習慣，……不請假就被人家卡掉（A2）；就是說今天不想工作就是不想工作，有的等於樂天知命的那種心情（A5）。

另外，受訪者亦提及，原住民雖然工作勤奮但喝酒問題確實影響工作機會：

其實原住民是滿勤快的，……但他們只要一喝酒，隔天就爬不起來，然後就連續兩三天沒有在工作（A2）；工作認真，就是喜歡酗酒，然後放假就不知道要回來工作，……這是一般人對原住民的詬病（A6）。

於此，大體來說，無論是原住民樂天性格無法迎合現代工廠日常慣例的僵化工作要求，或者是飲酒過度影響正常工作，相當成分都是跟原住民的社

會文化適應不良有莫大關係（李明政，2003）。

(三)教育改變集體就業習性

目前原住民與一般民眾比，教育程度即便仍普遍較低，但與早期相較已有某種程度的改善，且原漢之間互動較頻繁，也改善了彼此的一些隔閡。受訪者（A2）提到：「小孩現在在外面讀書都跟平地人一起了（國高中），那時候我們大部分都是在部落……那現在大部分都是個人出去工作。」

另外，受訪者（A6）也提及原住民教育提升與原漢接觸機會增多改變了群體外出找工作的習慣：

現在我們的民風沒有像以前這麼的保守，因為我們只要念國中就會接觸到漢人，所以我想不會像以前那麼樣的嚴重。有還是有啦，但是那種比例不會像以前那麼高，因為我們受教育的比例、程度都比以前多，這主要是教育的問題。

對此，受訪者（A6）更進一步強調教育對原住民提升就業能力和擴展人際關係的重要性：「你的教育程度愈高，相對的你的謀生能力、人際關係（原漢）、還有各方面的應對技巧都會提升」。

平實地說，原漢之間隔閡的舒緩，其原因固然很多，但原住民接受主流教育（漢化）的洗禮是最重要因素之一。多數受訪菁英指出，部落原住民接受較多國高中學校教育，透過學校場域原住民學生與漢人師生共同學習，增進彼此人際互動和改善隔閡。使得目前原住民集體就業的情況已漸不明顯，甚至個體外出找工作已日趨普遍，只不過部落出去的年輕人在職場競爭力方面還是不如漢人。換言之，部落原住民雖然教育程度提高了，但多數僅限於國、高中階段的教育，其適應後工業社會的能力依舊低於漢人，甚而還是成為底層勞動力的供應者。

(四)教育程度仍有待提升

依李明政（2003）、黃源協（2008）和盧政春（2002）的研究指出，原

住民目前在就業市場面臨最大的困難還是人力資本不足和教育程度低而找不到較穩定工作，因而只能在次級部門產業從事比較沒有工作保障的基層勞動工作。如受訪者（A1）提到：「我們的學歷低，因為像我國小畢業到外面沒有專長可以做什麼，我們到外面只能作工人，公司也不要」。受訪者（A5）也提及：「我們原住民就是教育比較低，所以就只能做一些低階層的工作」。另外，受訪者（A6）更提到教育對於原住民在求職或工作成就上的必要性：

原住民謀生能力會比較差，就是知識、學歷、還有沒有一技之長，……我們一般原住民大部分都是被指揮的那一型、被使喚的，人家叫你怎麼做你就怎麼做，這樣你怎麼會進步，你永遠都是在那階層，所謂的底層，你要到那中階的話比較難，第一個就是你要有知識。

誠如Wilson（1987, 1996）指出，美國貧窮階級難以翻身的關鍵因素，係源自低教育程度，因而接受高教育仍是下層階級提升社經地位的重要階梯。但有論者指出，當今臺灣社會擁有高文憑者大增，學歷提高並不保證能取得較高職位，甚至高學歷低職業或失業亦經常發生（李易駿、古允文，2007；黃毅志、陳怡靖，2005）。問題是，原住民的多重弱勢也唯有靠提高學歷才能實現脫貧和突破職業選擇限制。如受訪者提到：

我是覺得原住民的教育水準提高了，貧窮就會遠離我們了，就是有脫貧那種（A5）；提升原住民的教育水準，至少在選擇上比較多元，不會只有勞動性的工作（A4）。

然而，值得一提的是，許多至都市地區求學或謀生的原住民是在原鄉完成基礎教育，但一般認為原鄉學校在教育資源分配上明顯不足，很難提升原

鄉的教育質量，從而直接影響原住民族學生及勞工的競爭力。正如受訪者（A4）提到：

教育的話……城鄉差異真的是太大了，……在山上的話真的很缺乏（幼教資源更缺乏），但是政府沒做到嗎？有呀！但是就是城鄉差距，……據我的知道，目前在設備經費補助的還是很不足，好像很多是用來做防震的，改善設備不多啊。

對此，受訪者（A2）也表示：

應該是把師資、設備搬到鄉下來，至少把設備都用好，……很多過來都是代課老師，差不多一年就要走了，這個在偏遠地區的教師應該要改善。

就此而言，儘管原鄉教育問題涉及諸多結構面向，但師資設備不足一向是最被詬病的事項。

不過這類問題，在當今國內取得教師證照的師資極為充裕的情況下，若政府能提供適當誘因，師資問題應可獲得改善。再者，倘若圖書設備不足是影響學習成效的重要因素，那麼只要政府（包括民間社會福利機構）能積極為偏遠山地學校充實圖書設備數量，應可改善學生的學業成績（巫有鎰、黃毅志，2009）。即令如此，但亦有論者指出，充實原鄉學校的師資設備固然重要，但同時更不能忽略改善軟體的部分，包括改變教學方式、調整課程的內容及優先順序（莊勝義，2004）。對此，研究者98年度的國科會研究計畫曾經訪談信義鄉三位國中小學校長（布農族），當中某位校長提及：「教材方面我是覺得，當然那個教材都是固定的，但是有些科裡面的內容，……對我們原住民難度是比較高的」。但該校長也擔憂，要是課程內容融入原鄉本土的需求，而肇致課程內容與外界差異大，在臺灣升學主義掛帥的氛圍下將

不利於原住民學生的升學競爭力。

在當前僵固的教育體制下，原鄉學校主管爲了提振原住民學生的升學競爭力，一方面努力倡導國中生集體住校和參加課後輔導，以期養成學生良好的生活態度和讀書習慣；再方面加強技藝課程來誘發學生的學習興趣，並鼓勵往技職教育體系發展。如受訪者（A4）提到：

在山上呀，沒有什麼競爭呀，……學校多設一些吸引學生技藝訓練的課程……，可以吸引學生去唸書的那些科系（高職、科大）⁴。

凡此，或許能稍稍提升原住民學生的學習興趣和學業成績，但畢竟還是無法跳脫主流教育所設定的學習內涵和考試框架，以致原住民學生的學業成就和升學競爭力依然難有好表現。

因而有論者指出，當今原住民教育的重點不在於符合主流社會的學習內涵和思維框架，而是要從文化適切性角度設計出符合原住民族特色的課程內容和教學策略，以期讓原住民族學生能充分發揮潛能和提升整體教育程度（范麗娟，2010；莊勝義，2004；湯仁燕，2002）。然則，即令國內教育學者和教育實務工作者已相繼提出原住民教育改革的方略及建議，但改革步伐卻十分緩慢。不過無論如何，原住民族教育作爲整體國家發展不可或缺的一環，仍須社會各界積極付出心力以致之。

(五)不利的就業結構、外勞效應與景氣蕭條

在1990年代之前的臺灣經濟環境與就業機會算是相對成長的時代，這時期原住民在都市謀生雖然是從事體力勞動，但工作機會與報酬都算相對穩定。如受訪者（A6）指出：

⁴ 受訪者（A4）是國中女性教師，她對原鄉原住民學生之升學取向的看法，與國中小校長的觀點大致相同，皆認為非前段班學生應往技職教育體系發展。然則，受訪者（A4）由於沒有擔任主管經驗及較少參加各類原住民教育議題會議，以致較無法述及諸如治校理念或原住民教育政策改革。

我們原住民在都市大部分都是靠勞力，……以前我們原住民只要在外面做這工作就算很不錯的，一對夫妻這樣一天差不多四、五千塊……最近可能是因為受到全國的經濟衰退，……只好就被解僱，回到故鄉。

換言之，近年來國內產業經濟環境的轉變而影響到教育程度與技能不足之原住民的就業前景；再加上政府從東南亞國家引進外勞，原住民的就業機會更明顯受到排擠（黃坤祥、游皓瑋，2006）。

受訪者認為：

外勞幾乎都是勞動型的，大部分重疊啦（A4）；因為我們大部分都從事較低階層的工作，比較骯髒、不安全的工作，現在我們原住民做那些工作被外勞取代（A2）；所以「引進外勞很大的衝擊。我們以前有一些年輕人，出去工作一天大部分都2000多塊，現在用那個外勞比較便宜。所以我們原住民大部分的工作都被取代了，……很多人回來了」（A1）。

受訪者（A2）明白地指出：

應該要把他們的引進減少，多一點工作機會，其實現在外勞等於我們的原住民工作人口，那還是有登記的，沒登記的不止了。

職是，原住民菁英大都認為政府近幾年開放引進外勞是造成原住民工作機會流失、收入銳減的主因，以致建議政府應該對外勞政策重新檢討。但問題是，在目前全球化浪潮和國際勞動分工體系下，勞動力作為一種經濟生產要素在世界範圍流動是大勢所趨，甚至未來國內若泯除政治意識型態，引進大陸勞工也不無可能。因而問題的關鍵應該是在於如何協助低教育原住民提

升就業技能以及開發適合原住民族獨特文化屬性的創意產業，以期能創造原鄉的新經濟價值和部落居民的穩定收入。

二、原鄉有限的就業機會

(一)季節性農業工作機會有限

信義鄉原住民多半務農維生，但自1970年代初期以來，在資本主義優勢經濟力的入侵下，許多部落原住民已私下將土地紛紛拋售或轉租給漢人經營經濟作物而漸告流失（顏愛靜、楊國柱，2004）。以致目前在部落經營大量高經濟作物者大多是漢人。研究者有一次在訪問一位壯年失業者時，他無奈提到「原住民都人家丟了一點錢就把地賣掉了」，轉給漢人經營，自己留下的不多，且是很貧瘠、收成很差的土地，以致目前部落原住民爲了生計反而要成爲受僱於漢人農田的臨時工。

在部落一般臨時工資（婦女）不多：

務農的一天只給600（A3），在農忙季節從事精緻農業勞動者如採收葡萄，雖然清晨就要工作，但工資稍高：「我們這邊一天1,000耶」（A3）。

問題是，無論農忙、農閒期一天能賺1,000或600元，但栽種農作物都有明顯季節限制，以致在農閒期的就業機會更有限。受訪者指出：

我們信義鄉以農維生，以蔬菜、葡萄……反正是靠山生活吃飯罷了，現在很辛苦的啦，工作也不多（A1）；在休閒的時候工作就少，因為我們的農產都是季節性的，……所以大部分人還是會找其他工作（A2）。

換言之，在農閒期許多部落原住民爲了維持微薄收入會繼續尋找其他工

作機會，即便辛苦危險的低薪工作也競相爭取。

(二)921、風災、土石流重創原鄉生產活動

原本信義鄉的農耕活動每年也都擔心天災的侵襲，但自921後每遇颱風大雨外加土石流的肆虐，都使得部落農業作物滿目瘡痍。重要的是，大地震、天災後，許多部落原住民賴以維生的土地因走山、土石流或政府封山而消失，並嚴重影響部落生計。在災後重建十分緩慢的情況下，至今仍未能完全恢復正常耕作。受訪者表示：

一直到目前，最糟糕的是，我們的水圳不能維修，……因為就沒有水到我的農作物灌溉，變成說就是沒有辦法在那邊繼續種蔬菜（A1）；因為我們鄉內大部分是以臨時工為主，那就是整個山走山，……當然失業就比較多（A5）。

再者，信義鄉原本開始起步的觀光產業也在921後嚴重蕭條，且影響就業機會。如受訪者（A6）提到：

921發生的時候，……對我們的觀光產業是非常非常嚴重的影響，……在還沒發生921大地震時，我們那邊有很多園地（休閒區）、或是平台，它的價值都很高，921之後價格都一落千丈。……之後財團就都沒有再進來了。

由於921後，因走山、道路毀損，使得觀光及其他生產活動深受影響，迄今某些部落的重建工作尚未完成而損及部落的生存空間。

(三)回原鄉喝酒時間比工作時間多

至今雖然原鄉不時有條件較好的原住民遷移至都市尋求較佳的發展機會，但同時也有許多在都市謀生困難者回原鄉尋求生活機會。問題是原鄉的生活機會原本就有限，回部落的就業機會仍充滿不確定性，許多回鄉者依舊

待業中，頂多打零工度日。換言之，「鄉下的工作很少，大部分都不順利」（A6）。那為何回部落生活呢？受訪者提到：

至少回到自己的故鄉，然後還有一些打零工可以做，你在外面的話，你沒有工作就沒有收入，而且在外面什麼都要用錢，在我們山上還可以找一些野菜，或是向左右鄰居弄一些吃的（A6）；回到部落的話第一個就是他開支的錢比較少，因為在外面什麼都要開，在部落裡面喝水有礦泉水，山上也有野菜也都可以吃，在外面什麼都要錢（A1）。

回原鄉的原住民雖然可以在部落中求得簡單的溫飽，但部落的社會條件也很難擴展有效的人際網絡，在工作無著落、人際疏離的情況下，往往過著更消極的生活。受訪者表示：

因為他在外面的工作他已經習慣了，再回來到這邊要種田或種什麼他都没什麼經驗…都不會。……就是經常喝酒（A1）；這邊喝酒都不去工作，我有時候會罵啊，……幾個都會怕，有的不會怕（A3）。

依研究者觀察，確實發現許多失業原住民未到中午就開始喝酒，據說酗酒情況比之前在都市更嚴重。受訪者提到：

在都市的話是還好，因為你在都市你沒有工作就沒有收入，所以大家就盡量把握機會有工作的話就少喝酒，……那在部落的話就喝酒的時間比工作多（A6）。失業率高，回鄉找不到工作，年輕人現在回到故鄉一天到晚喝酒的不少，比前幾年多兩、三倍，像我們○○部落的，你們上次去有沒有看到一堆一堆的人，……都醉倒了（A6）；很多（回鄉者）事實上是沒有工作做，沒事情做才去喝酒的（A4）。

對此，夏曉鵬（2010）即指出，原住民酗酒問題，是跟原住民在資本主義下時時面臨失業危機（藉酒澆愁）息息相關。而筆者要強調的是，當今就業市場的專業需求瞬息萬變，求職找工作競爭激烈。政府若沒有積極協助部落失業者提升技能和就業，那麼未來將進一步惡化其再就業的可能性，並極有可能從此在貧困中潦倒一生，再也很難重回就業市場。

三、發展地方文化產業：原鄉美夢？

全球化趨勢造成了世界各部分的標準化、西方化，但同時也促成了多元化、差異化，它表現於對地方文化認同及地方文化的重新發掘，並重新肯定這些地方文化的存在價值（黃瑞祺編，2005）。這預示著全球化並非只是將全世界文化推向同一性，它同時也意味著地方文化差異的產生，且對不同文化產品的消費或觀光正日漸受到人們所關注。這個發展趨勢，在當今後物質主義（post-materialism）時代，人們熱衷於追求生活多樣性和生活品質提升的氛圍下更為顯著（Giddens, 1994）。換言之，隨著現代社會的消費者可支配所得增加和休閒時間增多，以及消費品味與需求的改變，人們對具有特殊文化主題的消費和有助於提升生活品質的文化觀光參與日趨重視，同時也帶動愈來愈多國家更積極將促進文化產業發展作為其地方經濟再生和創造在地就業的主要策略（Lash & Urry, 1994; Scott, 2000）。近年來在國內也日益看重地方文化產業與經濟發展的銜接，尤其在多元文化觀點的催促下，原鄉地方文化產業被視為再造原鄉生機、拯救傳統文化和提高部落就業機會的最佳出路。我國政府目前也計畫能藉由推動原鄉的經濟文化發展政策，進一步落實部落在地就業的目標，並由此達致原鄉的自主發展能力。

（一）文化、觀光與精緻農業同步擴展的可行性與侷限性

根據研究發現，原住民地方菁英對於原鄉朝向發展文化產業、觀光產業與精緻休閒農業的構思與計畫，頗多贊成。但問題是部落菁英也質疑這些理念和計畫真正實現的日程表在何時，在目前的條件下似乎不可能達成，甚至未來能否達成這些計畫目標還值得懷疑。

1.困難的三合一。受訪者（A6）也認為同步開發觀光、文化與精緻農業來實現在地就業立意甚佳，但他指出：

要做到這三個裡面的其中一個，還有一段很艱辛的路程要走，不是那麼快就可以做到。因為我的工作○○課就是在做這個，我也常常在規劃到這個政策，但是提到中央部會之後常常就是限於經費。……到目前都沒有下文，所以我接○○單位主管感覺到對這方面力不從心，幾乎都是我自己抱著計畫，我從○○課就有這概念，……然後到○○單位就專門做這個，結果都沒有成，所以就感覺到很遺憾。

另外，受訪者（A2）也提到舉凡觀光開發計畫、文化產業計畫，在信義鄉長期以來都有在提案和推動：

計畫是有，好像一大堆，但是都礙於經費，是不是都這樣。好像餅都畫得很大，規劃的那麼大、那麼好，但最後都不了了之，這也是我在○○單位的悲哀，我覺得每次我都在寫，……但最後都沒結果。

受訪者（A2）更指出，目前開發計畫都是紙上談兵居多：「現在幾乎都在用談的方式，都是一些學者來這邊做說明、講座、輔導，但是講到最後什麼都沒有做」。很顯然地，受訪者（A2）和（A6）均對地方產業開發計畫既熟悉又期待，但礙於中央政府遲遲未能落實原鄉發展政策也相當無力感。

2.有限的精緻農業。受訪者（A6）提及，信義鄉目前較可行的應先發展精緻農業：

這三個（文化、觀光、農業）馬上感覺到會比較有把握或馬上有成效第一個是精緻農業，精緻農業有了以後就開始往觀光，觀光就脫離不

了我們在地特色（A6）。

但受訪者（A6）也表示，精緻農業雖可期待但發展有限：

目前農業比較好是開始走向那種溫室、有機農作，可是為什麼到目前沒有那麼普遍，因為第一個它要投資不少，……然後很多那些管線、還有一些機械（技術），……我們○○村目前有在做溫室的好像還不超過十戶。

由於部落原住民普遍資金不足，而許多保留地因沒有辦理重新登記，加之貸款手續複雜且額度低（公告地價低），以致部落小農很難轉型為高成本的精緻農業。受訪者（A1）提到：

政府給我們的貸款，……但他限制說原住民貸款沒有很多，因為我們的保留地地價稅沒有提報（重新登記），我們就拿一兩甲地的所有權狀去貸款，只有幾十萬，那個地少的貸不到多少啊。

換言之，即使精緻農業未來作為政府在部落推展和獎勵的產業，但在部落中可能只有少數經濟能力佳的農戶或菁英有足夠資金經營與獲取政府獎勵而得益。在黃應貴（2006）的研究中亦提到，當地布農族呈現貧富懸殊的現象，且愈成功者愈懂得投資和經營事業。因而目前在原鄉要普遍性的推展精緻農業還很困難。

3.空轉的觀光業。當今觀光產業被視為是偏遠地區經濟發展的重要策略，但發展原鄉觀光產業所涉及的諸多結構性條件，舉凡交通條件、政策法令、投資資金、專業人力培養和各部落整合等層面猶需一一克服。受訪者提及921後信義鄉有許多封山的山路還未修通，其他一些山路也沒有拓寬，遊覽車上不去：「像我們還有很著名的七彩湖，那邊也很多生態可以看，但是

現在都封山了，……現在都只有小部車可以進去」（A2）。再者，還有政府限建法令的問題：

因為農委會有訂一個法，在河床五百還是一千公尺以內都不能開發，那我們很多居住在河床邊邊的就永遠不能蓋大樓。我們上次也是有陳情啊，結果還不是一樣（A6）。

至於是否能培訓足夠的各類觀光領域人才，也是目前必須面對的一個重要課題：

觀光呀！就要培訓一些人員，一些導覽人員（A4）；我在公部門也是常常在報計畫，第一個就是觀光產業這方面我們要培養人才，可是政府限於經費的關係沒有了（A6）。

最後，原鄉普遍貧窮，更不用說部落原住民有能力籌措足夠資金發展觀光事業：「做觀光業要很多錢啊，像飯店、民宿很好但是也要有本錢，所以原住民通常好像做不起來」（A4）。正如陳芬苓（2008）提到，原住民本身資金有限、籌措不易，因此不得不依靠漢人資金的引入以開發經營，但到頭來原住民大多只能依附在漢人老闆之下從事服務生、清潔工等打雜的職務。由此顯見，即便部落觀光產業興盛繁榮，似乎只會造成原住民在艱辛的就業歷程中再度受到資本壓榨而無法擺脫弱勢地位。

4.消失中的文化藝術創作。近幾年政府計畫將原住民族獨特的傳統文化資源與休閒觀光相結合成地方文化產業，並藉此讓更多參與文化產業的原住民重新尋回自族文化和文化認同。但問題是，原鄉觀光休閒產業一直處於低度發展，又原住民爲了在市場經濟底下求生存而不得不放棄難以維生的文化藝術創作，從而造成傳統文化藝術逐漸失傳。

例如受訪者提到部落中專精傳統藝術創作者非常少了：

我們有一個老人家，是羅娜的，他會編背包，就是以前我們原住民去打獵的時候要背的，那東西都掛在家裡（不懂行銷），只有有需要的才會跟他議價說你這個賣多少，好像很便宜耶。這快要失傳了（A5）；藤編沒人買，很多人都是這樣，所以到最後就失傳了，有的目前還留下來就是興趣（A6）。

由菁英觀點來看，傳統藝術品無銷售管道、不符合成本和難藉此維生，⁵是造成愈來愈少人從事文化藝術工作的主因。然而，倘若從多元文化角度來看，如何教育和訓練年輕一代原住民傳承部落文化是必要的，如同受訪者（A6）表示：「一定要去延續，因為如果失傳的話，我們的文化就無法延續」。

但據研究發現，目前政府對於部落傳統藝術的維護與推展並不積極。受訪者（A1）表示：「我們鄉公所有一次辦雕刻比賽，這些都是很優秀的，都刻的很好。就是我們政府沒有看到這些人，現在不辦了……」；受訪者（A6）更提到：

我的工作○○課就是在做這個，我也常常在規劃這個政策，但是提到中央部會之後常常就是限於經費，或延辦，延到下年度……就沒消息，那些藤編等的文化就沒辦法發展。

由此顯見，政府對於無法即刻為國家帶來經濟產值的原住民文化事務，通常不願大力支持。

對此，謝世忠（2004）即指出，對於臺灣原住民族文化的復振，重點或許不在於它能為國家帶來多少經濟效益，其所傳達的深遠意涵是在於滿足長

⁵ 關於此，本研究多數受訪者期待政府能協助部落建立產銷系統和行銷計畫，以增進藝品銷售和提高收入。

期受壓迫和日漸喪失自族文化根基之原住民族對於文化認同的需要。就如西方國家，在發展經濟和推動工業文明的同時，對於保存原住民的文化風貌和促進其生活安全等層面，亦投入相當多的資源和經費。基於此，我國政府此刻實應秉持多元文化理念，積極整合相關部門，並由原民會統籌主導規劃，大力挹注資源，落實原鄉發展政策和文化建設，以期改善原住民族因歷史不正義所造成之多重弱勢地位和文化大量流失的傷痕。

(二)政府短期促進就業與職業訓練計畫成效不彰

依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2008b）的調查顯示，政府對原住民的就業問題，在近幾年已陸續推出許多訓練方案和短期促進就業計畫。例如從2002年原民會結合民間資源推動「部落在地就業計畫」與「多元就業開發方案」，即開始實施一系列有關原鄉產業發展、職業訓練和短期就業的政策。但受訪者表示，目前原鄉產業發展有限，就業問題難改善，即便政府在原鄉提供一些促進就業措施，也都屬於應急之策：

現在政府最不好的就是他們要看到那種立竿見影的成果，他們不喜歡教那個技術型的（長期職訓），……因要看到成果要好久，不會馬上顯現，政府最喜歡看到的就是馬上顯現的（A6）。

因而就目前來說，舉凡短期工作能否轉型成為穩定就業的問題、職業訓練能否落實訓用合一的問題，都值得檢討。

首先，政府在原鄉推展的短期就業措施不切實際。受訪者表示：

政府在這個部分是有提供以工代賑啦，……然後社區居民很踴躍報名，時間性很短、用輪的，……就讓他做清掃的工作（A5）；那個只是暫時性的，那個沒辦法長久，……都只是半年或一年的時間，那只是暫時抑制住失業率、降低失業（A2）。

顯然至今我國政府在原鄉推行的各項就業計畫，盡是直接安置工作「掃地」，而沒有為受助者施予任何訓練。這類短期工作不但無助於提升案主的就業技能，且還會製造福利陷阱，誘使案主設法留在方案中或徘徊於方案。如受訪者（A5）所言：「那個以工代賑，就是還蠻多人去報名的，那有的人就一直認為他希望可以一直待在那個工作，不要去替換」。因此，政府對原鄉的協助應避免實施這類消極性福利，此刻政府應積極構思如何規劃有效的福利措施和整體性就業支持政策，將教育、訓練、就業和福利各部門緊密連結，同時並舉，同步擴展，以幫助弱勢原住民提升就業能力。

其次，政府在原鄉舉辦的職業訓練功能不彰。受訪者提到：

說難聽一下只是在消化經費，並沒有針對地方的需求性來辦，勞委會是針對他們年度的政策就下鄉來辦，可是結訓了之後不了了之，所以我覺得很浪費。……最近我們原民會透過勞委會有縣政府的原民局在我們鄉辦○○研習班，有證照的，請○○大學在我們部落辦，……但取到證照之後有工作嗎？他們就說沒有。……中央在辦這種研習班應該要針對各個地方的特殊性，…我們的政策是由下而上，不是由上而下（A6）；在地就業（職訓）喔，那個應該是要因地制宜（A4）。

換言之，在職業訓練方面，需因地制宜，「由下而上」提報訓練計畫，以符合當地原住民就業需求的項目，才不至於造成有職訓、有證照也找不到工作。

關於此，筆者認為，政府應該引進西方福利國家行之有年的工作福利理念，借助非營利或營利專業團隊針對不同部落的就業需求進行完善的評估與培訓。在策略應用上，一方面先長期培植在地原住民職業訓練師資和訓練方案規劃之專職人才，以期讓部落有能力自行規劃和爭取各類跟自族文化特色相關之職業訓練計畫的經費補助，來為部落居民進行培訓工作；再方面必須獎勵跟文化保存延續有關的產業和工作，以期讓更多原住民願意留在原鄉投

入跟地方文化相關的工作。唯有如此，才可能開創出具特色的地方文化產業和職業種類。

伍、結論與省思

本研究經由對6位原鄉菁英的訪談，試圖對原鄉發展困境、回鄉者生活難題以及政府倡導發展地方文化產業促進部落在地就業等議題，進行初步的探索。希望藉此能提出一些原鄉實況的分析資料，及發展一些改善原鄉部落的思考路徑。底下本文依研究發現與文獻討論的分析脈絡，提出幾項說明。

一、原住民低教育程度與艱辛就業歷程

在臺灣資本主義擴張時期，原住民成為工業部門不可或缺的勞動力，但礙於教育程度普遍低落，多數只能從事風險高、替代性高的底層勞動工作。以致當國內產業外移和政府引進外勞時，使得原住民勞工大量失業，有些因而返回原鄉，只是原鄉生活機會亦有限，形成低教育原住民無論在都市或原鄉頻頻面臨失業危機，而失業貧窮帶來的經濟和精神壓力，更成為原住民飲酒的原因。此意即，當今原住民族嗜酒問題，並非起因於民族性而是就業歷程的不順利。在本研究中多數菁英認為，當今原住民就業歷程最大的障礙是人力資本不足，以致若要克服原住民的失業貧窮困境和突破職業選擇限制，擁有較高學歷是必備條件，問題是，現行教育體制與課程框架著實不利於原住民的升學競爭力。雖然長遠角度，唯有徹底改造原住民族的教育結構，並將之與總體的就業結構和職業結構緊密連結，才能真正改善其劣勢處境，但這畢竟是極大的社會工程，期程可謂漫漫長路。唯今之計，猶然需要加強提供各項優惠措施，好比考試加分、落實定額僱用，以協助原住民能夠順利升學和保障就業機會。如此，一方面可避免原漢間的貧富差距擴大，再方面能培養更多可以參與規劃原住民族事務的人才。

二、原鄉工作機會少，回鄉謀生困難

本研究發現，近年來有許多在都市失業且轉業困難的低教育原住民被迫返回原鄉，但部落除了少許農業工作外，並沒有其他工商活動的工作機會，加上近幾年風災水患、土石流屢屢橫行，使得部落就業機會遭受極大的衝擊。雖然政府陸續在原鄉推行短期就業措施，但總是供不應求，許多返回原鄉沒土地、沒人際關係的弱勢者時常要登記2年或3年，並通過面試才能獲得短期工作機會。平時爲了生計，必須在部落找其他臨時工作，但工資極低，好比婦女一天才600元，且還得跟外籍勞工競爭有限的工作機會。由於工作收入極不穩定，有時甚至連子女的健保費和教育費都無力負擔。這些現實生活難題，顯然與前文論及政府的原鄉就業政策之目標有極大落差。

三、原住民地方文化產業遙遙無期

我國政府爲了解決原鄉的就業需求，近幾年的就業政策開始規劃與在地文化產業發展相結合，以期創造更多長期就業機會。但政府長期秉持「由上而下」的政策制定模式，以及各部會對原鄉事務的權責無法整合，導致原鄉發展計畫和就業政策不符合在地需求，形成政策窒礙難行或流於形式。因而至今信義鄉地方文化產業的發展有限，舉凡觀光休閒產業礙於天災、交通、法令和資金問題依舊低度發展；精緻農業受限於原住民資金和技術不足難普及；傳統文化藝術創作因藝品滯銷和人才不足難維繫。凡此顯示，近年來政府相關部門致力於推動原鄉地方文化產業來活絡部落、增進就業與振興教育文化的政策目標仍難實現。然而，倘若原鄉地方文化產業是值得繼續推展的國家型大計畫，那麼政府未來理應增加原民會的權責，強化其統籌規劃與政策執行的力量，並結合在地意識和地方需求，逐一克服原鄉產業發展的各項障礙。

誌謝：感謝匿名評審悉心斧正。本文係國科會專題計畫（NSC 96-2412-H-126-001）的部分研究成果。

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分

王增勇（2002）。從原鄉經驗看社會救助政策與原住民文化的相容性。中大社會文化學報，14，131-166。

朱柔若（1999）。外勞引進與原住民勞動市場地位的邊陲化。政策月刊，52，23-26。

朱柔若（譯）（2000）。W. L. Neuman著。社會研究方法——質化與量化取向（Social research methods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pproaches）。臺北：揚智。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2007）。95年臺灣原住民經濟狀況調查報告。臺北：行政院原民會。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2008a）。96年原住民就業狀況調查與政策研究（就業狀況調查報告）。臺北：行政院原民會。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2008b）。原住民就業政策報告研究。臺北：行政院原民會。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2010）。99年原住民就業狀況基本調查。臺北：行政院原民會。

何家豪（2002）。族群、性別、階級交織出都市原住民的就業困境——以有限責任臺北市原住民清潔勞動合作社為例。國立中正大學勞工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嘉義。

吳天泰（2007）。部落學院與原住民族學院比較研究初論。載於吳天泰（主編），臺灣原住民族導論——文化教育篇（頁21-33）。臺北：五南。

巫有鑑、黃毅志（2009）。山地原住民的成績比平地原住民差嗎？可能影響臺東縣原住民各族與漢人國小學生學業成績差異的因素機制。臺灣教育社會學研究，9（1），41-89。

巫銘昌、黃燕萍（1998）。企業界主管對於原住民就業問題態度研究。原住

民教育季刊，11，1-30。

李易駿、古允文（2007）。機會開放或結構限制？臺灣青年從學校到職場轉銜過程中的Yo-Yo現象。臺灣社會研究季刊，67，105-152。

李明政（2003）。文化福利權。臺北：松慧。

林萬億、孫健忠、鄭麗珍、王永慈（2005）。自立脫貧方案操作手冊。臺北：內政部。

范麗娟（2010）。臺灣原住民教育——社會學的想像。臺北：松慧。

夏曉鵬（2010）。失神的酒：以酒為鑑初探原住民社會資本主義化過程。臺灣社會研究季刊，77，5-58。

孫治本（譯）（1999）。U. Beck著。全球化危機——全球化的形成、風險與機會（Was ist globalisierung?）。臺北：臺灣商務。

孫健忠（2009）。「工作」與「福利」連結的試析：從「勞役所試煉」、「工作福利」到「工有酬」。臺灣社會福利學刊，8（1），119-147。

馬財專、余珮瑩（2008）。我國產業外勞之生活與工作之管理。就業安全，7（2），118-124。

張培倫（2009）。歷史不正義、族群導向積極賦權行動政策與原住民族——一個初步研究。臺灣原住民族研究季刊，2（1），1-29。

張清富（2001）。都市原住民社會問題史。載於蔡明哲（主編），都市原住民史篇（頁279-316）。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莊勝義（2004）。原住民族教育的效率與正義。國教天地，178，13-22。

莊勝義（2007）。面對全球化與市場化的高等教育。教育資料與研究雙月刊，79，61-88。

郭俊巖（2010）。美國工作福利政策的形成與轉化——以AFDC改革為例。臺灣社會福利學刊，8（2），117-159。

郭俊巖、王德睦（2008）。全球化下脫貧策略的政治經濟背景研究——從Anthony Giddens觀點的探討。東吳社會工作學報，18，105-134。

郭俊巖、許佩茹（2010）。失業者返回部落謀生的就業歷程之研究——以信

- 義鄉為例。《社會發展研究學刊》，7，1-28。
- 陳芬苓（2008）。原住民經濟困境與地方文化產業發展之可能——以桃竹苗地區為例。《國家與社會》，4，1-42。
- 陳珊華（2009）。臺灣原住民族的人口結構變遷及其對教育政策之啓示。《教育政策論壇》，12（3），1-33。
- 陳逸君（2004）。多元文化教育觀點下的原住民族教育——南投縣某國中學校布農族籍學生教育民族誌之初步分析。《研究與動態》，11，233-248。
- 傅仰止（2001）。都市原住民概說。載於蔡明哲（主編），《都市原住民史篇》（頁1-60）。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 傅從喜（2006）。我國公共服務擴大就業計畫之再就業效果評析——從積極勞動市場的角度。《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10（1），115-149。
- 曾筱甯（2001）。我國原住民族就業機會保障體制之研究。東吳大學社會學系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北。
- 湯仁燕（2002）。臺灣原住民的文化認同與學校教育重構。《教育研究集刊》，48（4），75-101。
- 黃坤祥（2005）。外籍勞工引進對臺灣原住民工作權之影響。《兩岸與國際事務季刊》，2（4），65-94。
- 黃坤祥、游皓瑋（2006）。高屏澎東地區原住民參與職業訓練就業輔導行為意向之探討。《公共行政學報》，21，1-37。
- 黃源協（2008）。建立原住民族社會安全體系之規劃。臺北：行政院原民會。
- 黃瑞祺（編）（2005）。A. Giddens著。《全球化與第三條路——紀登斯在臺灣》（Globalisation and the third way: Giddens in Taiwan）。臺北：松慧。
- 黃毅志、陳怡靖（2005）。臺灣的升學問題——教育社會學理論與研究之檢討。《臺灣教育社會學研究》，5（1），77-118。
- 黃毅志、章英華（2005）。臺灣地區族群交友界限之變遷——1970年與1997

年的比較。臺灣社會學刊，35，127-179。

黃應貴（2006）。布農族。臺北：三民。

詹宜璋（2003）。原住民各類人口群潛在福利需求之探討——2000年臺閩地區戶口及住宅普查資料分析。社會發展研究學刊，5，93-113。

劉千嘉、林季平（2008）。臺灣原住民的回流及連續遷徙——2000年戶口普查分析。地理學報，54，1-25。

衛民（2000）。原住民就業安全體系基本架構之初探。臺灣社會學刊，24，281-326。

鄭陸霖、吳泉源（譯）（2004）。F. Block著。後工業機會——一個批判性的經濟社會學論述（Postindustrial possibilities: A critique of economic discourse）。臺北：群學。

盧政春（2002）。臺灣原住民族就業促進總體策略之探討。東吳社會學報，12，93-136。

謝世忠（1987）。認同的污名——臺灣原住民的族群變遷。臺北：自立晚報社。

謝世忠（2004）。族群人類學的宏觀探索——臺灣原住民論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

簡守邦（2008）。Workfare——贊成與反對。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25，143-203。

顏愛靜、楊國柱（2004）。原住民族土地制度與經濟發展。臺北：稻鄉。

譚光鼎、張如慧（2009）。蘭嶼中學原住民文化課程現況之探究——原住民社區本位課程的分析觀點。當代教育研究季刊，17（1），75-106。

鐘琳惠（2007）。全球化趨勢下我國就業安全政策及其展望。臺灣勞工雙月刊，7，26-33。

（二）英文部分

Bauman, Z. (1998). *Work, consumerism and the new poor*. Buckingham, UK: Open University Press.

- Blair, T. (1996). *New Britain: My vision of a young country*. London: Forth Estate.
- Burchardt, T., Le Grand, J., & Piachaud, D. (1999). Social exclusion in Britain 1991-1995. *Social Policy & Administration*, 33(3), 227-244.
- Coates, D. (2000). *Models of capitalism: Growth and stagnation in the modern era*. Cambridge, MA: Polity.
- Dicken, P. (2003). *Global shift: Reshaping the global economic map in the 21st century*. (4th ed.). New York: Guilford.
- Esping-Andersen, G. (1999). *Social foundations of postindustrial econom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Esping-Andersen, G. (2009). *The incomplete revolution: Adapting to women's new roles*. Cambridge, MA: Polity.
- Giddens, A. (1994). *Beyond left and right: The future of radical politics*. Cambridge, MA: Polity.
- Giddens, A. (1998). *The third way: The renewal of social democracy*. Cambridge, MA: Polity.
- Giddens, A. (2000). *The third way and its critics*. Cambridge, MA: Polity.
- Handler, J. F. (2004). *Social citizenship and workfar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stern Europe: The paradox of inclusion*. Cambridge, M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andler, J. F., & Hasenfeld, Y. (2007). *Blame welfare, ignore poverty and inequalit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ash, S., & Urry, J. (1994). *Economics of signs and space*. London: Sage.
- Latham, M. (2001). The third way: A outline. In A. Giddens (Ed.), *The global third way deb* (pp. 25-35). Cambridge, MA: Polity.
- Lødemel, I., & Trickey, H. (2001). A new contract for social assistance. In I. Lødemel & H. Trickey (Ed.), *An offer You can't refuse: Workfare in*

-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pp. 1-40). Bristol, UK: Policy.
- Pierson, C. (1998). Contemporary challenges to welfare state development. *Political Studies*, 46, 777-794.
- Piven, F., & Cloward, R. (1993). *Regulating the poor: The functions of public welfare*. New York: Vintage.
- Quaid, M. (2002). *Workfare: Why good social policy ideas go bad*.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 Romano, F. (2006). *Clinton and blair: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third way*. New York: Routledge.
- Scott, A. (2000). *The cultural economy of cities: Essay on the geography of image-producing industries*. London: Sage.
- Tomlinson, S. (2005). *Education in a post-welfare society* (2nd ed). Maidenhead: Open University Press.
- Wilson, W. J. (1987). *The truly disadvantaged: The inner city, the underclass and public polic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Wilson, W. J. (1996). *When work disappears: The word of the new urban poor*.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 Wolff, J. (2004). Training, perfectionism and fairness. *Journal of Applied Philosophy*, 21(3), 285-295.